

明清八股文欣赏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所采用的一种专门文体。又叫制艺、制义、时艺、时文、八比文等。它要求文章题目一律用《五经》、《四书》中的原文。体裁结构有一套固定的格式。全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等部分组成。

八股文去世百年祭

在中国历史上，八股文曾是只文化恐龙。明洪武八年，朱元璋颁布开科取士，是年八月，京师及各省举行乡试，次年三月，在京师举行会试。由于所试的《四书》疑问及经义所采用的仍然是元代格式，考出的人才不符合朱元璋的要求，深感失望的朱元璋遂于洪武六年下令停考，开始思考科举考试的文体问题。之后十年，他与刘伯温经过反复的研究，创制了一种新的考试文体，这就是八股文。八股文自洪武十五年横空出世，明清 500 年间，绝对是思想文化界的霸王龙。读书人皓首穷经，无不竞奔于科举之途，若八股文作得不通，就百无一用。如蒲松龄这样的奇才，放在当今，至少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八股文写得不好，因此身逢康熙盛世，也只落得辗转沟渠，一辈子当一个三家村的教书先生。毫不夸张地说，八股文横行之时，上下五百年，方圆五万里，几乎所有的县处级以上干部都是由它而晋升的；几乎所有想当而未当成县处级干部的读书人，都是被它扼杀了的。1901 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宣布废除以八股文取士时，神州大地竟是一片悲痛惊惶之声，读书人哀嚎，如丧考妣。但八股文终于被废除了，这只文化恐龙终于死掉了。

八股文死去一百余年了，没有人再对它感兴趣，没有人再去研究它。因为毛泽东同志《反对党八股》一文行世，“八股”这个词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贬义词存在与我们的语言中。城市里的孩子很容易说出许多恐龙的名字，也可以描绘这些恐龙的模样，但大学里的文科教授，很少能说出八股文的子丑寅卯，我们对八股文的摒弃，可谓完全彻底。然而，这种现象是很不正常的。既然一篇博士论文可以研究几百年前某个小地方的米价，一本专著可以研究一种很少人使用且已消亡的文字，而对于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八股文为何如此不闻不问呢？明代十六帝，除开国之君太、成二祖外，大多昏庸乖戾，万历朝神宗竟数十年不上朝见大臣，天启朝熹宗放着国事不问，天天只醉心于干木匠活。在这样的状况下，明代的政权还持续了二百六十六年，而且，大部分的时段是太平之世。这就不能不归因于明代的取士制度，源源不断地为帝国的统治提供了大量的合格人才，即便在皇帝罢工的情形下，还维持着国家政权系统的正常运转。八股文考出的这些干部，绝大多数是合格的管理工作者。1644 年清军入关，对旧明实力犹如摧枯拉朽，清朝统治者对明末政治的腐朽，应该是有深刻的认识，但他们认为八股文是个好东西，于是在科举考试中承袭下来，直至清末。提到中国近代史，我们会说落后挨打，但不要忘了，清代的版图是中国历史上最广的疆界，康乾盛世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力。拔高一点说，中国这五百年间的辉煌，是八股文造就的。

清代学者、散文名家也是八股文大家的方苞说：“制艺（即八股文）之兴七百余年，所以久而不废者，盖以诸经之精蕴，汇涵于四子之书，俾学童而习之，日以义理浸灌其心，庶几学识可以渐开而心术归于正也。”历史经验表明，儒家正统思想最适合于中国封建社会，以之为指导思想，并用以培养、选拔人才，最容易造成思想、文化的大一统。明成祖朱棣颁行《御制四书大全》后，书中传注只取程颐、朱熹两家，士子们习八股文就不得不对这些内容读得滚瓜烂熟，其中的思想内涵也就会深深地进入他们的心灵。八股文作为一种考试文体，其格式有苛严的要求，由破题、承题、原题、起讲、入题、提二比、中二比、过接、后二比、束小二比、大结等部分组成，结构严谨，章法细密，因此，写作八股文是一种极严格的条理化训练，逻辑思路不严密的人是写不好八股文的。做事有条理，是一个管理者的重要能力。学习八股文是训练，考试八股文就是检验。经过检验的人才，委以事务，他总可能处理得八九不离十。简而言之，八股文的作用有二：其一，有效地向人们灌输了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其二，训练、检验了国家管理者的基本素质。八股文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保持社会的发展，功莫大焉。在任何时代，稳定不都是压倒一切的事情么？

八股文当然有弊端，那时的政治、社会模式也有弊端，这些弊端是体制中的原始病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病灶会慢慢地发生癌变，最后不可救药，但这不等于说八股文从一开始就不该存在。五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指责那时为何不搞资本主义民主，为何不采用一种比八股文更好的考试手段，就好像五百年后的地球人责问我们这代人为什么不住到月球上去。

八股文自停科举之后，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偏激之词层出不穷，而且，八股文本藏书家不重，目录学家不讲，图书馆不收，曾经汗牛充栋的范文选本，百年间零落失散，已极难寻觅，因此，近现代以来，几乎没有人对八股文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以至一些颇有名望的专家、教授，讲到八股文时也笑话百出。今有龚笃清者，湖湘奇才，早年以小说名世，后入我国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之门，研习民俗学，近年致力于明代文化的研究，先有《冯梦龙新论》行世，颇得学问家好评。一次偶然的机缘，在旧书摊上购得一堆八股文选本，心中不由一动，于是悉心搜寻，积年而有成，自诩若论明清八股文古籍的收藏量，“鄙人虽不敢称第一，至少也要名列收藏最多者之列”。好火遇到好钢，就炼出一本《明代八股文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洋洋五十余万言，材料翔实，立论精辟，言前人所未能言，言今人所未敢言，即便对雄才大略朱元璋，亦有诛心之语。除了学理的探讨，书中还很多与八股文有关的名人逸事，读来饶有兴趣。笃清先生此书出，如同发掘了一具文化恐龙的化石，我们参观之余，定会赞叹：真大！真霸气！它的影响还在吗？也许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明代八股文欣赏

八股文的远源，一般地常追溯到北宋的王安石、苏辙诸家的“经义”，南宋陈傅良诸家的“奥论”内容也即是“经义”。还有从破题等技术方面，又追溯到“律赋”等文体。还有从明代篇后用“大结”，借发挥经义引到陈述、评论政治问题，又牵涉到“策问”等等。不过通常意义上的八股，就是始于明初的。为了更好的欣赏典型的明代制艺，这里只分析明中叶以后的标准八股文。

八股时文之设，本来就是为全面考察士子对经义的掌握程度，以及对文辞的提炼能力，

并进而选拔优秀的人才入仕朝廷，执掌政权，因而只求全面考察士子之功力，并不求其能够传扬文名。如此要求之下，制艺有许多苛刻的要求，其破题、承题、起讲、八股四比、大结都有一定的程式，且极为苛刻，以致清代以来一直有人谈八股色变。不过，由于明代文教千古第一，客观上，许多明代八股文即使在文学上也是上乘之作。本文只求把明代制艺佳作呈上，大家共同欣赏，品味这古今中外最妙不可言的文学奇葩。

为了更好地理解明代先贤的文章奥妙，先将制艺的基本格式介绍一二：

制艺的题目，按规定只取自四书。考官任取四书的某一句或一段，这就是题目了，显然，接下去的正文自然就是考察学子们对该段经义的理解了。因而按规定，制艺的正文第一句必须是所谓的“破题”，破题，通俗的理解就是分析题目：本文主要讲些什么。八股文的破题，规定只用两句。也有三句的，多半是有一个长句中有略顿处，像是三句的。这两句主要是概括题义、解释题义，但又不能直说题义，作得好的，常是既透彻又概括。很长很复杂的题目，要用简单的两句把它点明；短到一两个字的题目，也要用比题字多几倍字数的两句话把它说透。破题是作时文的首要，好的破题，往往有一种只可意会的妙处，如以“子曰”二字为题，破题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是不露题目一字而把“子”（孔子，至圣先师）、“曰”（孔子所说，至理名言）二字说得不但非常透彻，而且绝对不能移到别人身上。这就是最标准的破题了。破题之后是承题，承题就是承接破题要点，再加以补充说明，使论点更加明瞭、圆满。如题目“不以规矩”，破题云：“规矩而不以也，惟持此明与巧矣。”其承题则云：“夫规也、距也，不可不以者也。不可不以而不以焉，殆深持此明与巧矣。”。承题一般以三句为标准。

接着就开始起讲了。正如《明史·选举》所言的“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其“代古人语气为之”，就是假设你就是孔子、孟子，人家问你这句经文怎么解？你怎么回答？有人比喻说这个就像演戏，其实也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也因为这个，八股文中不许出现孔孟以后发生的典故，这个是个附带要求了。一般可以“若曰”开头，“孔子就是像这么说得”，云云。也可以用意谓、且夫、今夫、尝思等字，看个人的风格了。“若曰”后面可以跟一段散文，多少句数并无定法，可以任意伸缩。

起讲以后就是真正的八股四比。股、比，是专有名词，其实就是对联而已。一比就是一对对联，而一段上联或下联就是所谓的一股了。也有的时候文只有六股，不一定是严格的八股。至于每一股的长短，原则上没有限制。不过，要讲清题目，还要以对联的形式写，这个难度就很大了。而且当你信手写完其中某一大段后（相对容易些），就要把上面这篇文章当成上联，严格的配上一个下联，这就相当的困难了。明人说写四六文似难实易，而时文似易实难，就是这个道理。也因为这个，对联在明朝相当兴盛，并一直延续至今。而对联不就是八股的一部分吗？八股，就是四幅对联啊！从对联这个意义上看，假如我们并提唐诗宋词明八股，是很有道理的。

写完八股（就是四幅对联，当然，对联间也可以插入些过渡字句，谓之过接），然后就是收结了。可以简短几句话收结，也可以是长篇大论，就是所谓大结。如此，一篇优秀的制艺就写好了。

掌握了明代制艺的写作方法，就可以真正欣赏明代先贤的时文佳作了。

王鏊《百姓足，孰与不足》（论语·颜渊）

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

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

盖谓：公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盖先足其民乎？诚能百亩而彻，恒存节用爱人之心，什一而征，不为厉民自养之计，则民力所出，不困于征求；民财所有，不尽于聚敛。

间阎之内，乃积乃仓，而所谓仰事俯育者无忧矣。

田野之间，如茨如梁，而所谓养生送死者无憾矣。

百姓既足，君何为而独贫乎？

吾知

藏诸间阎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归之府库，而后为吾财也。

蓄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积之仓廩，而后为吾有也。

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

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

牺牲粢盛，足以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资朝聘之费。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给之也，其孰与不足乎？

饗飧牢醴，足以供宾客之需；车马器械，足以备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应之也，又孰与不足乎？

吁！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

费宏《君子不重则不威，学而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
君子之于学，贵有其质而必尽其道也。

盖质非威重，所学必不能固也。然道或未尽，亦岂能有成哉？

昔圣人之意若曰：君子以自修为学，而必以威重为先。

若言动之间，浮薄轻佻，既不足于厚重；

则应酬之际，粗率慢易，亦不见其威严。

虽曰学以明善，吾知其若存若亡，未必服膺而勿失也；

虽曰学以复初，吾知其随得随失，未必力行以求至也。

盖轻乎外者必不能坚乎内，有其质者斯可以从事于学矣。

学之道奈何？

惟诚乃善之基也。存诸心者，必忠信是主，不矫伪而无物焉；

惟伪乃恶之门也，发于事者，必忠信是主，不欺诈而无实焉。

取友所以辅仁，友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矣，故所友必求其有益，岂可泥交而苟合乎？

改过乃能入德，过而惮改，则恶长而善微矣，故有过必勇于自治，岂可畏难而苟安乎？

此皆学问之道所当自尽，而威重之质所由以成者。君子其亦知所务哉！

圣人论学，内外相须，而其功不可缺；终始相因，而其序不可乱，可谓密矣。

王守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圣人于心之有主者，而决其心德之能全焉。

夫志士仁人皆有心定主而不惑于私者也。以是人而当死生之际，吾惟见其求无惭于心焉耳，而于吾身何恤乎？此夫子为天下之无志而不仁者慨也，故言此以示之。

若曰：天下之事变无常，而生死之所系甚大。固有临难苟免，而求生以害仁者焉；亦有见危授命，而杀身以成仁者焉。此正是非之所由决，而恒情之所易惑者也。吾其有取于志士仁人乎？夫所谓志士者，以身负纲常之重，而志虑之高洁，每思有植天下之大闲；所谓仁人者，以身会天德之全，而心体之光明，必欲有以贞天下之大节。是二人者，固皆事变之所不能惊，而利害之所不能夺，其死与生有不足累者也。

是以其祸患之方殷，固有可以避难而求全者矣，然临难自免，则能安其身而不能安其心，是偷生者之为，而彼有所不屑也。变故之偶值，固有可以侥幸而图存者矣，然存非顺事，则吾生以全而吾仁以丧，是悖德之事，而彼有所不为也。

彼之所为者，惟以理欲无并立之机，而致命遂志以安天下之贞者，虽至死而靡憾。

心迹无两全之势，而捐躯赴难以善天下之道者，虽灭身而无悔。

当国家倾覆之徐，则致身以驯过涉之患者，其仁也！而彼即趋之而不避，甘之而不辞焉。盖苟可以存吾心之公，将效死以为之，而存亡由之不计矣。

值颠沛流离之余，则舍身以貽没宁之体者，其仁也！而彼即当之而不惧，视之而如归焉。盖苟可以全吾心之仁，将委身以从之，而死生由之勿恤矣。

是其

以吾心为重，而以吾身为轻。其慷慨激烈以为成仁之计者，固志士之勇为而亦仁人之优为也。视诸逡巡畏缩而苟全于一时者，诚何如哉？

以存心为生，而以存身为累，其从容就义以明分义之公者，固仁人之所安而亦志士之所决也。视诸回护隐伏而觊觎于不死者，又何如哉？

是知观志士之所为，而天下无志者可以愧矣，观仁人之所为，而天下之不仁者可以思矣。

陈子龙《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

无后世之名，圣人之所忧也。

夫一时之名，不必有也，后世之名，不可无也。故君子不求名，而又不得不疾乎此。

夫子若曰：好名者，人之恒情也。故下士求名，人亦不得以为躁，但我恨其急一时之名，而非千秋万世之名耳。若君子则知所以审处于此矣。

以为一时之名，自我为之，而其权在人，苟我之聪明才力，注乎名则有名，而皆倚人以为重，盛与衰我不得而知之，而此名而名者也；

千秋万世之名，自人为之，而其权在我，苟我之聪明才力，注乎名未必有名，而常修己以自立，高与下我将得而定之，此名而实者也。

名而名者，无之在于未没世之前，君子岂可以徒疾乎？

名而实者，无之在于既没世之后，君子岂得而不疾乎？

人之生也有爱有憎，故有幸而有名者，有不幸而无名者，至于身没之后，与其人不相接，则不可曰爱憎之所为也，而寂寂者竟如斯，则将何以自异于里巷之子耶？人之生也有失势有得势，故有幸而无名者，又有不幸而有名者，至于身没之后，与其时不相及，则又有非得势失势之可论矣，而泯泯者遂如斯，则又何以自别于草木之俦耶？

人之贵乎荣名者，贵其有益生之乐也；君子之贵荣名者，贵其有不死之业也。死而无闻，则其死可悲矣；死而可悲，则其生更可悲矣。是以君子抗节砺行，唯恐不及耳。人之所以为没世之名者，是我身后之计也；君子以为没世之名者，是我大生之事也。死而无闻，则其死不及忧矣；死不及忧，则其生大可悲矣。是以君子趋事赴功，惟日不足耳。

人但见君子之为人也，誉之而不喜，毁之而不惧，以为君子之忘名也如此，而不知有所

甚不忘也；不大言以欺人，不奇行以骇俗，以为君子之远名也如此，而不知有所甚不远也。

盖有大于此者而已，有久于此者而已。若夫营营于旦夕之间，是求速尽者也，好名者岂如是乎？

中晚明还有不少狂士戏作游戏八股，最著名的就是**唐伯虎**的这篇**《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或疑后人伪托，不过该文出自晚明，到清初曾经尤侗润色则无疑）。题目摘自《西厢记》，于是就以张生的口气来若曰，**全文如下**：

想双文之目成，情以转而通焉。

盖秋波非能转，情转之也。然则双文虽去，其犹有未去者存哉。

张生若曰：世之好色者，吾知之矣。来相怜，去相捐也。此无他，情动而来，情静而去耳。钟情者正于将尽之时，露其微动之色，故足致人思焉。

有如双文者乎？

最可念者，啭莺声于花外，半晌方言，而今余音歇矣。乃口不能传者，目若传之。

更可恋者，衬玉趾于残红，一步渐远，而今香尘灭矣。乃足不能停者，目若停之。

惟见盈盈者波也，脉脉者秋波也，乍离乍合者，秋波之一转也。吾向未之见也，不意于临去时遇之。

吾不知未去之前，秋波何属。或者垂眺于庭轩，纵观于花柳，不过良辰美景，偶而相遭耳。犹是庭轩已隔，花柳方移，而婉兮清扬，忽徘徊其如送者奚为乎？所云含睇宜笑，转正有转于笑之中者。虽使靓修 于靦面，不若此际之销魂矣。

吾不知既去之后，秋波何往。意者凝眸于深院，掩泪于珠帘，不过怨粉愁香，凄其独对耳。惟是深院将归，珠帘半闭，而嫣然美盼，似恍惚其欲接者奚为乎？所云渺渺愁余，转正有转于愁之中者。虽使关羞目于灯前，不若此时之心荡矣。

此一转也，以为无情耶？转之不能忘情可知也。以为有情耶？转之不为情滞又可知也。人见为秋波转，而不见彼之心思有与为之转者。吾即欲流睐相迎，其如一转之不易受何！

此一转也，以为情多耶？吾惜其止此一转也。以为情少耶？吾又恨其余此一转也。彼知为秋波一转，而不知吾之魂梦有与为千万转者。吾即欲闭目不窥，其如一转之不可却何！

噫嘻！

招楚客于三年，似曾相似；

倾汉宫于一顾，无可奈何。

有双文之秋波一转，宜小生之眼花撩乱也哉！抑老僧四壁画西厢，而悟禅恰在个中。盖一转也，情禅也，参学人试于此下一转语。

入清以后，由于文字狱的压力越来越大，士子作文也越加拘谨了，随着乾嘉考据一派的兴起，作文解经变成训诂小学，明代制艺文章的风骨就再不复存在了。而由于八股出题限制于四书，四书的有限文字，到清代乾隆时就基本用尽，几乎所有的章句都有了现成的范文，这时的满清统治者不思扩大题源，或另易题材，反而越来越多的出些断句不通的题目，什么“王速出令反”（《孟子》有“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什么“君夫人阳货欲”（“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是《论语·季氏》的末句，“阳货欲见孔子”是《论语·阳货》的首句），就根本荒唐无比了。这类“截搭题”在满清中后期的大量出现，标志着有明一代辉煌的制艺文章经历了康乾时期的回光返照后，无可奈何的衰亡了。

清朝科举八股文赏析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韩菼（清）

圣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破题）

盖圣人之行藏，正不易规，自颜子几之，而始可与之言矣。（承题）

故特谓之曰：毕生阅历，祇一、二途以听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穷于其际者，往往而鲜也。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独得而无与共，独处而无与言。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适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语尔也。（起讲）

回乎！人有积生平之得力，终不自明，而必俟其人发之者，情相待也。故意气至广，得一人焉，可以不孤矣。

人有积一心之静观，初无所试，而不知他人已识之者，神相告也。故学问诚深，有一候焉，不容终秘矣。（提比）

回乎！尝试与尔仰参天时，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出题）

汲于行者蹶，需于行者滞。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则行者乎，此其人非复功名中人也。一于藏者缓，果于藏者殆。有如不必于藏，而舍之则藏者乎，此其人非复泉石间人也。

则尝试拟而求之，意必诗书之内有其人焉，爰是流连以志之，然吾学之谓何？而此诣竟遥遥终古，则长自负矣。窃念自穷理观化以来，屡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余以自处者，此际亦差堪慰耳。

则又尝身为试之，今者辙环之际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与人同学之谓何？而此意竟寂寂人间，亦用自叹矣。而独是晤对忘言之顷，曾不与我质行藏之疑，而渊然此中之相发者，此际亦足共慰耳。（中比）

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与尔也。（过接）

惟我与尔揽事物之归，而确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迁，而祇自行其性分之素。此时我得其为我，尔亦得其为尔也，用舍何与焉，我两人长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

惟我与尔参神明之变；而顺应无方，故虽积乎道德之厚，而总不争乎气数之先。

此时我不执其为我，尔亦不执其为尔也，行藏又何事焉，我两人长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后比）

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而斯时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束股）

「原文介绍」

本文为康熙十二年（1673）韩菼参加会试的考卷，并以此文名列第一。乾隆称赞他“雅学绩文、湛深经（文）术。所撰制义，清真雅正，开风气之先，为艺术楷则”。

「原文作者介绍」

韩菼，字元少，江苏长洲人。康熙十二年（1673），会试、殿试均名列第一，授修撰。历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尚书等职，康熙四十三年（1704）卒。

■名家点评

韩菼文章全文解析

□王学泰

韩菼的这篇文章是清代八股文中比较规范的一篇，其题目出自《四书》原文。在科举历史上有许多题目属于怪题。

在当时也受到一些批评。但八股文的特征之一就是困难见巧，怪题难，更可以显出作者的巧思。例如考官出了个○作为题目，这只是书中的一个圈点，有的考生“破题”说“圣贤立言之先，得天象也”。古人认为天圆地方，人道本乎天道。

把没有意义的一个圈说得有意义了，非常巧妙。这也是八股的特征：“没话找话”。韩菼的这篇文章题目不怪，是孔子与其弟子颜回讨论古代士人用舍行藏两种生活选择的。

在八股文中，题目就是对此文内容的界定。全文只能就题目展开，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仿佛挖井，从井口到井底要一样粗。此题只能讨论“用舍行藏”、孔子颜回以及孔对颜说，这些问题。八股文有一定的程式和字数。关于程式的名称在文中一一注明。

“破题”是指开篇的两句（个别有三句的）解释或概括题意，但要换个说法，不能与题面重复。破题是全篇最重要的。本文的破题很好。“圣人”指孔子，“能”指颜回。“行藏之宜”，指恰到好处的“行藏”。“微示”二字不仅体现孔颜的师生关系，也突出了颜回的悟性，响鼓不用重槌敲。

“承题”是用三四句话进一步阐明题意。此段言孔子讲的关于行藏的道理，人们很难理解、效法，只有颜回对它稍有把握，所以孔子才与他谈论这个问题。

“起讲”从文章说是第三段，可是从八股文是“代圣贤立言”这个角度看。它是文章的正式开始。从这段起，文章都要模仿圣贤语气说话了。

所谓“圣贤”就是《四书》的孔子、孟子及其弟子。本文是以孔子语气说话的。

起讲是散句，可以不对仗，全段不能超过十句。本文的起讲可见孔子循循善诱的情态。起讲表面上只分析“惟我与尔”，没有讲“用舍行藏”，但它包含在“独得”“独处”这些话语中。

“提比”起讲只是个过渡，提比则正式开始入题。

提比着重剖析“惟我与尔”，点明人需要益友与知己。描写了获得知音和得到沟通的喜悦。

“出题”提比中把“用舍行藏”隐蔽在剖析“惟我与尔”之后，在“出题”中把它引出来，并为“中比”作准备。在孔子看来“行藏”不单纯是做官与不做官的问题。孔子有一种天赋的使命感。因此谈它必然与“天时”“人事”和自身的经历遭遇联系起来。有唤起下文的作用。

“二小股”提比之后本为虚比，这样“提、虚、中、后”各两股，凑为八股。清代以后，虚比逐渐被忽略，八股实际成了六股。这篇的两小股，实际上是“虚比”遗意。

“中比”是文章主体的主体。从正面讲“用舍行藏”的“拟而求之”（寻求学习）“身为试之”（运用传播），这是从“知”到“行”的。中比“主要讲”用舍行藏“，但最后仍归到”惟我与尔“。

“过接”是个过渡句。意为：这样我想到了自己的体会，想到了与你互相启发。承上启下。

“后比”进一步申说“惟我与尔”。这组对句的上句说，我们都能总揽事物的变迁，能够独立自主，任凭形势之变，而能坚持自己的精神理想，用舍是外界的事，不能改变我们内在的品质，这是最大地实现了本来的自我（性分之素）；下句讲如果我们能够顺应和参与神明之变，那么连砥砺道德、加强修养、不注重气数命运的变化也都是小事一桩了。这是进一步超越了自我。从文章角度说，这是“宕开一笔”，留有余味。

“束股”是结语。“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是照应题面：是这样吧！惟有我们两人对此有所理解。这时颜回在喜悦中默默领会了老师的教诲。

八股文本来是一种很死板僵化的文体，但此文却写得感情充沛，文笔生动，对仗工稳。文中孔子循循善诱，又能自我解剖，是位好老师。

“提比”“出题”中“回乎”“回乎”，“过接”中的“念夫”“念夫”都回荡着感情的涡流。本文对仗在意义和声调上都很讲究。没有上下句意义重复的“合掌”，其思想内容有递进。八股的对仗不同于骈文的对仗，更有别于诗词的对仗。它是散文的对仗，其中很少有骈文和诗歌对仗的跳跃性，读时不觉其为对。这种对仗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它同样是音调铿锵，富有音乐性。

八股文之爱、恨、情、仇

八股文其实就是古代一种标准化考试，其苛刻的程度还不及现在的高考。明清学子除了对付科举，还颇有闲暇做其他的事，可以娶妻生子，可以吟诗作画，还可以读史论道。也不存在什么一考定终生，今年考不上，明年还可以来，考个十年八年，机会还是均等的。而现在的学生，进入初中就被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之后便是大考连小考，一直要苦干六年，到高考时，已经是严重地透支了生命。高考更是一锤定音的买卖，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因此学生的心理压力也比考科举的古人大得多。抨击八股文得人总喜欢说八股文是如何如何束缚人的思想，是如何如何没有用，殊不知现在的高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文科综合考试，第一个要求就是观点正确，如果观点不正确，那怕你写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也不会给分；再譬如你的志向是搞历史研究，也必须考数学——考很多很多非常艰深而对将来又毫无用处的数论、几何、三角等等。

所以讲白了，科举和高考一样，只不过是一种选拔人的方式，或者说，是种淘汰人的方式，目的就是要设个门槛，让少部分人过去，大部分人过不去。用西方一句名言说，就是“所有不好制度中为害程度较轻的那一种”。

明清以后，国家的各级行政管理人员，绝大多数因写八股文而晋身，求仕而不得者也是写不好八股文而铩羽，读书人对于八股文的感情可谓爱恨交加。一般情况应该是这样：过不了关的当然是大加挞伐，而深得八股文之利者就会赞扬它的好处。清代著名才子袁枚少有异议，12岁就成为县学生，但此后却连试数科而不得中举人，故对八股文衔怨极深：“时文加以割裂搭截，侮圣人之言哉，且从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为优孟衣冠，代人作语者，惟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摹口吻为工。”清代大散文家也是八股文名家的方苞却说：“制艺之兴七百余年，所以久而不废者，盖以诸经之精蕴，汇涵于四子之书，俾学者童而习之，日以义理浸灌其心，庶几学识可以归于正也。”

但有些人科举考得并不如意，对八股文却很有好感。清代名臣左宗棠自诩才高八斗，连曾国藩也不放在眼里，但考试成绩却不如曾，终其身只是个举人，左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他并没有迁怒于八股文，反而对八股人才赞赏有加，他曾在书信中说：“今之论者动谓人才之不及古者，由于八股误之，至以八股人才相诟病。我现在想寻几个八股人才，与之讲求军政，学习吏事，亦了不可得。间有一二曾由八股而得科名者，其心思较之他人尚易入理，与之说几句《四书》，说几句六经，即目前事物随时指点，是较未读书人容易开悟许多。可见真作八股者，必体玩书理，时有几句圣贤话留在口边，究是不同的。”明代奇才李贽，嘉靖三十一年乡试中举，以后便不应进士考试，而且看不起用科举制度，嘲笑考官无能，说自己参加考试，只是想当一名誊录生。其思想离经叛道，甚至非孔斥圣。但对八股文却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八股文和院本、杂剧、《西厢》、《水浒传》一样，“皆古今至文”。文学作品和八股文，虽然都是文字写成的东西，但创作原理与写作技巧截然不同，李贽讲将其统称为古今至文，可谓是第三只看八股。有些人则八股写得漂亮，最后也凭这手功夫当官入仕，对八股文的态度却是“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明代散文大家归有光，也是八股文大师，写八股文的名气在当时比写散文还大，35岁乡试中举，60岁会试成进士，后经大学士高拱推荐，任南京太仆寺丞，参修《世宗实录》。但参加考试的次数多了点，曾“八上公车不遇”，于是将自己的这门看家本领斥为“攫取荣利之资”。上海浦东新区最繁华的那一块，过去一直叫陆家嘴，明成化年间出了个叫陆深的人，28岁就考上进士，中二甲第八名，进了翰林

院，后来担任过四川布政史、太常卿兼侍读学士等职。完全是靠写八股而平步青云，但说起科举、八股却咬牙切齿：“举业者，非致理之路也，其弊也浮华而无实用。”当过大学士的桂萼也倚老卖老地指责后学：“经书初解章句，便拟题作文字，竟为浮华放诞之言，以便有司之口，遂致破裂经传。”

八股文写作是一种比较严格的程式化训练，有固定的套路，对写作者的逻辑思维能力要求较高，而对人的独立见解却限制较多，因此，有才气的人不一定就写得八股文，代表人物就是蒲松龄。蒲公天性颖慧，文冠一时，所著《聊斋志异》，其想象之丰富，构思之精妙，用词遣句之高超，明清五百年间无出其右者。但此翁的八股文水平却不怎么样，他于顺治十五年也就是他18岁时应童子试，以县、府、道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但此后屡战屡败，考到古稀之年而不第，直到71岁时，才因其精神可嘉，授例成为“岁贡生”。大约蒲松龄飘逸的才思，接受不了八股文那种刻板规矩的束缚。明末大才子张岱，出身于累代仁宦之家，阅历广泛，读书颇丰，著述弘富，有纪传体明史《石匱书》，散文写作亦为一代手笔，其《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为晚明小品文之集大成者，被人称为“文中乌获”、“后来斗杓”。但此君的考试成绩和蒲松龄差不多，乡试屡为败北，终生只得一领秀才青襟，非常郁闷。他虽然才思敏捷，妙笔生花，但对写八股文却视为畏途，因此说：“诸体之难，无过于制艺（即八股文），盖用以镂刻学究之肝肠，亦用以消灭豪杰之志气也。”

奇才龚自珍的科举经历，更是突出表现了思想奔放、才情恣肆与八股文严肃刻板的矛盾。自嘉庆十五年，也就是他19岁时，第一次参加乡试，至道光九年以第95名被取为进士，龚自珍一共参加了10次科举考试，考举人考了4次，考进士考了6次。中举之后，龚自珍兴奋地带着自己历年所写的2000多篇八股文去见父亲的同年进士姚学棣。姚先生在赞赏他才气之余，指出他的八股文是“笔墨兼用”，意思是说文章写得不错，但个人的胡思乱想也多了些。龚一气之下，将2000多篇八股文一把火烧了。龚自珍是一个十分不甘寂寞的人，一辈子以天下为己任，写八股文也喜欢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会试通过，中进士以后，按规定还有殿试、朝考两关，前者正式决定中进士的名次，后者决定任职去向。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亲自主持，另设阅卷大臣协助，一般是就当时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写一篇命题论文。龚自珍却将这篇命题作文写成了自己的政治宣言，大有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气派，而且在文中抨击科举。大约龚自珍本人对这篇文章是很满意的，多年之后，他在一首诗中回忆当时的情景：“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一副“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架势。但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以举子的身份而大谈国是，犯了别人的忌讳。结果公布出来，龚自珍只中了三甲第19名。当年正值南疆张格尔叛乱拖了7年之后终于平息，朝廷正忙于善后事宜，因此道光皇帝出的朝考题目是《安边绥远疏》，让考生们陈述对治理边疆的看法。他奋笔疾书，大谈自己“以边安边”主张，而且直言无隐，批评朝廷治理西北的措施不当。考官看了他的卷子，心想你小子也太胆大了，参加个考试居然如此宏论滔滔，但又不便说他文章写得不好，只判了个书写不规范。最后道光皇帝大笔一挥，让他去当一个七品知县。满腔热血的龚自珍从头凉到了脚，回到家里，越想越气：翰林院的老家伙们不是说我字写得不好吗？我就搞点黑色幽默给他们瞧瞧。他一声令下，让女儿、媳妇甚至婢女们全都练习翰林院的楷书。后来遇人提到翰林，他就说：翰林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字写得工整吗？我家的妇女人人都可以当翰林。

明末清初的狂人金圣叹，写八股文干脆就是一副无厘头的做法。此人于“稗官野史，无所不窥”，独不喜“四书五经”的枯燥乏味，尝自谓“自古至今，止我一人是大材”，其放诞不羁，溢于言表。因恃才傲物，讥讽考官，游戏科场，而多次被黜。据说他本姓张，考秀才因“试

文怪诞”而未被录取，后改名参试，才中了秀才。参加乡试，考题为“西子来矣”，要求以越国的西施出使吴国的史实，给予评说。金圣叹写道：“开东城，西子不来；开南城，西子不来；开北城，西子不来！开西城，则西子来矣！西子来矣！”整个就是一科考场中的周星驰；考题是“如此则动心否乎？”金圣叹就写：“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葭苍而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乎？曰：‘动动动……’”连写了39个“动”字。第二年再考，题目是“孟子将朝王”。金圣叹在试卷上不写一字，却在考卷的四角写了四个“吁”字，并说：“前乎此题者，已有四十孟子，是‘孟子’二字不必作也。至云‘朝王’，则如见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皆朝王耳，是‘朝王’二字，亦不必作也。题目五字中，只有‘将’字可作。”他又说：“没有看过演戏吗？王将视朝，先有四个内侍，站在左右发‘吁’声。这实际上是‘将’字的意思。”金圣叹的幽默，非止戏写八股，他后来因“哭庙案”被砍头，临死还在两只耳朵里各塞一个纸团，一个里面写“好”字，一个里面写“痛”字，真是“幽默死了”。

明末另一个大才子冯梦龙，更是和八股文死掐了一辈子，有说不清的恩怨。世人只知道冯是著名的文学家、戏曲作家和编辑家，却很少知道他还是写作八股文的名家，而且是第一流的八股文写作教练。冯梦龙自幼聪慧异常，8岁被举为神童，11岁就中了秀才，此后，便研究八股文的写作技巧。写《春秋》类题目的八股文天下无敌，还先后编纂了《麟经指月》、《春秋衡库》、《别本春秋大全》、《四书指月》等教学参考书，深得读书人青睐，有人得到书稿，居然称：“在本坊如获拱璧，愿海内共宝夜光。”但冯梦龙写八股名满天下，教八股惠人无数，自己考科举却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自11岁中了秀才后，岁试、科试、乡试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却始终考不上个举人。明代科举的考题皆出自《四书五经》，考制还规定，凡秀才、举人要专治一经，以为参加乡试、会试的首艺，冯梦龙钻研的就是《春秋》。五经之中，以《春秋》最为艰深，冯梦龙浸淫既久，文笔难免古奥，像《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文章写得连考官也看不懂了。这样反反复复地考，八股文一直写了46年，考得自己也烦躁了，只好在57岁时，出贡当了贡生了事，和蒲松龄的结局一样。冯梦龙一生虽然愤世嫉俗，放浪形骸，经常过一种“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的生活，对功名却也非常热衷，有浓厚的科举情节，且才高气傲，名倾一时，当时与之素昧平生的人也说他“文章霞焕，才辩珠流，天下之仕莫不延颈企踵”。然而，就是这样的冯梦龙，却屡试不中，快退休的时候才捞了个“荣誉举人”当当，其心情之郁结，是可想而知的。

明清以来，才子而写不好八股文者大有人在，即便写好了八股而又屈死于科考者也不乏其人，但也有人将才气与八股文写作结合得很好的，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汤显祖所作《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玉茗堂四梦》，是明代戏剧的颠峰之作。尤其是其代表作《牡丹亭》，以横溢的才华和遒劲的笔力塑造出生动而丰满的艺术形象，并融会了晚明进步社会思潮的精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汤显祖本人也因之成为与关汉卿齐名的伟大文学家，有研究者甚至称他是“中国的莎士比亚”。汤显祖的科举之路基本上也是一帆风顺，他14岁中秀才，21岁中举人，会试虽两次名落孙山，但还是在33岁时就中了进士。汤显祖出生于书香门第，祖上四代皆有文名，因此汤才子很小就进行严格的八股文训练，八股文成就之高，当时就被称为“江西四雋”，清代的赵吉士更是将他与归有光等8人并称为明代“举业八大家”。汤是杰出的戏剧家，擅长塑造人物形象，其八股文写作也体现出这一特点，喜欢模拟人物的口气代圣人立言。难得的是他的八股文写得文采斐然，引人入胜，同时又中规中矩，大雅天成，因此入而科举，出而戏剧，左右逢源。苏州人唐寅，博学多才，能诗善画，与仇英、沈周、文征明并为“吴门四家”，曾刻印一方，自诩为“江南第一才子”。其书画创作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突出的地位，他的山水人物画，大幅气势磅礴，小幅清隽潇洒，面貌丰富多样，行笔秀润缜密；书法则出化于赵

体，俊迈轶群，很有功力。诗词创作亦有独创的成就，其诗真切平易，不拘成法，大量采用口语，意境警拔清新。唐寅虽然几岁就能写文章，但对科举并不经意，生活风流放荡，“一意望古豪杰，殊不屑事场屋。”世传“三笑点秋香”的故事，就是他这种生活的写照。苦读苦考的诸生当然看不惯了，讥笑他只会玩。唐寅遂曰：“闭户经年，取解首如反掌耳！”意思是说，只要用功一年，就可以考个举人第一名。试想冯梦龙济济于科举，考到老也没有中个举人，唐寅出此狂言，真让人觉得他不知天高地厚。然而，一年后应天府乡试，他果然高中解元，拿了个举人第一名，而且写出的八股文“方严正洁，近于老师宿儒”，无丝毫放达不羁之气。后人王巳山评价他的八股文：“至大至精，增减一字不得。风流放达之人，有此卓然可传之作，宜于大节自凛凛也。”唐寅可以说是明清八股文写作史上少有的奇才，惜乎弘治十二年会试，受人牵连，被捕下狱，后被罚至浙江藩府为椽吏，唐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最后饮酒伤身，54岁离开人世。

中国人喜欢用“伯乐相马”的故事比喻人才的选拔，如果说人才是马的话，那么科举就是路，而八股文则是缰绳。韩愈为千里马鸣不平，也只是说“辱於奴隶人之手，骈死於槽枥之间”，并没有主张它去作一匹可可西里的野马。诗人李贺一心要出仕，也是希望自己像马一样，被驾驭者“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金圣叹游戏科场，可谓空前绝后，但听说顺治皇帝读了他的文章说：“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便遏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向北叩头谢恩，而且写下“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这样的谀词。人在尘世，要做天马行空，难啊！明清读书人要成人才，就得写八股，考科举；现在读书人要成人才，就得参加高考，过四六级，考申论。古往今来，这就是人才的宿命。唐宋以后的各路名家巨匠，完全没考过科举者寥寥无几，所谓的“唐宋八大家”中，除苏洵之外，个个都是进士出身；明清两朝，没写过八股文的人物，更如凤毛麟角。不夸张地说，中国自有科举以后，绝大多数的政治、文化名人，都走过这条路。唯一的例外是李白，但他不是人才，是天才！